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y.2020.08.006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罗丽琳,蒲清平,黄燕.大数据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276-286.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y.2020.08.006.

Citation Format: LUO Lilin, PU Qingping, HUANG Yan. Big data boosts mainstream ideology leadership research[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5):276-286.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y.2020.08.006.

大数据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

罗丽琳¹, 蒲清平², 黄燕³

(1.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 重庆 401120; 2.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3. 中共南充市委党校,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网络已经成为凝聚共识的新空间,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至关重要。但是,当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能力不能完全适应网络空间复杂性、引领机制不能充分调动客体积极性、引领方式方法缺乏实效性、引领资源整合力有限,不能完全形成引领合力等尚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研究认为,大数据方式契合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大数据精准捕捉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点,二是大数据及时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兴趣点,三是大数据链接整合网络意识形态资源点,四是大数据融入新时代大众“网络”生活圈。因此,应用大数据思维及其方法可以在以下四方面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一是提升引领主体的引领能力,通过树立大数据意识、主动学习大数据技术、善于应用大数据技术来提升引领主体能力;二是激发客体参与引领的动力,通过优化意识形态引领决策机制、提升意识形态引领的动力机制、优化意识形态引领的协同机制来激发客体动力;三是汇聚全面思想引领合力,通过精准捕捉网络燃爆点、精准识别网民兴趣点、精准把握网民诉求点、主动融入网民生活圈等汇聚引领合力;四是增进思想引领过程效力,通过树立共享共治的大数据整合资源理念、开发合作共赢的大数据共享共用平台、实施大数据网格化资源管理整合机制等增强引领效力。通过以上四个方面,以此有效提升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关键词:大数据;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261.5;D64;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5-0276-11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数据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综合治理研究”(2018YBMK00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史’教育融入大学生党团班级活动路径研究”(22SKSZ018);西南政法大学202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高校研究生学术诚信预警机制研究”(2021XZXS-083)

作者简介:罗丽琳,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Email:122652729@qq.com;蒲清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研究背景与学术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1]。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在网络空间中由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在我国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它是话语体系传播在网络空间的外在展现,主要依靠网络数据信息的传播,而得以为国民认知。与之密切相关的引领力,是指引导、带领的力量,其中包括引领的方向和引领的力量;而意识形态引领力则是指社会对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也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民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显然,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遵循。事实上,在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常常形成大量的数据沉积,哪些信息有用?哪些信息更容易被关注?哪些信息具有危险性?如何收集、处理、加工、分析这些信息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增进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从而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将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学界高度关注网络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张宽裕、丁振国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是基于虚拟的网络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是虚拟社会网络个体与现实个体间渗透融合生成的意识形态新样态;付安玲、张耀灿则着力解释了大数据、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内涵。(2)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研究。杨嵘均认为,网络本身对意识形态形成解构和重构;王永贵认为,网络思潮、网络舆论与社会矛盾交织共振常常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国内问题国际化,进而挑战网络治理能力;而范如国、高世杰则认为,治理结构不合理、方式不科学、能力不足等困境容易降低治理实效性。(3)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对策研究。学者们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冯刚、陈旻),网络思潮引领(陈锡喜、左鹏、毕红梅),网络舆论导向(余双好、郭明飞、蔡骥)等教育引导策略。(4)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技术路径。部分学者探讨了大数据参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与凝聚力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显然,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必须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价值和作用,加强大数据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助推作用。

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手段、方式的现实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3]。事实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各种社会思潮、社会舆论和网络文化在网络空间交织耦合,对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形成巨大冲击和影响,切实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十分重要。然而,要把网络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当前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手段和方式上尚存在一些现实困境。

(一) 意识形态引领能力不能完全适应网络空间复杂性

1. 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

一方面,网络主体具有虚拟性。以大数据为载体的信息交流,其重要特点就是各交往主体以匿名

的形式进行^[4],大多上网者利用虚拟身份在网络上发布和接收信息,其意见、观点的表达很容易出现群体亢奋,表现出“乌合之众”的特性,某些非理性言论完全可能引发非理性行为^[5];另一方面,网络信息具有欺骗性,在巨大的网络信息流中很多时候难辨真假。实际上,当前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能力尚无法精准识别网络主体,不能及时辨别网络信息真假,甚至难以把控意识形态风险点。

2. 网络空间具有快速性

在网络空间,网络信息、舆情舆论不仅是巨量的,其变化速度也十分迅速。显然,这对意识形态引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发事件必须应对迅速、高效,才能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实践中,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大多根据已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缺乏预防措施,有些应对甚至严重滞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率和速度不能完全应对网络的快速性变化。

3. 大数据手段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干扰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价值挖掘具有开放性、共享性。但网络意识形态由于存储介质的数字化,在大数据工具的特质影响下,网络意识形态信息较易受到大数据手段的干扰。大数据作为一种“非结构型数据”^[6],不需要现实固定载体的面对面传播和感知,因此,大数据手段的运用极易获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相关信息,并进而造成一系列干扰。事实上,当前意识形态引领力还不能有效消除大数据手段的干扰,不能完全适应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复杂环境。

(二) 意识形态引领机制不能充分调动客体积极性

网络意识形态引领机制传统化、分散化,缺乏创新和系统整合,主要表现为激励机制不完备、协同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提升意识形态引领主体能力及调动客体积极性。

1. 激励机制不完备

作为一种机制与手段,激励能够促进和提升意识形态引领主体的引领能力,当前激励机制不完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励机制没有层次划分、不够具体,表现为激励目标过于简单,没有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划分分解,使意识形态引领主体难以掌握,导致激励效果不够显著;二是激励方式方法缺乏创造性,大多沿用传统激励方式,没有结合时代发展而及时创新。

2. 协同机制不完善

网络意识形态引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调动客体积极性,必须树立系统性思维,统筹网络各要素及其各方面^[5]。当前协同机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缺乏系统协同。综合性职能部门缺乏统筹整合,导致各部门、各平台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协商,未能做到扩大共识、加强共建。比如,要把握网民的思想动态,要从其上网浏览视频音频、购物消费历史等整体综合性数据中进行分析挖掘,便需要各部门合作沟通,加强针对性引领。另一方面,缺乏多元主体协同引领。政府是网络意识形态引领的主体,企业、学校等主体参与意识形态引领较少,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引领,因此不能有效调动客体积极性。

(三) 意识形态引领方式方法缺乏实效性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社会中总会包含着种种彼此交叉、彼此冲突的价值诉求^[7]。当前,国际局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任何组成部分发生变化都不会是孤立实践,文化和社会思潮也不再是静止、隔绝地存续于它的初始载体,其传播和更新业已成为不可拒的潮流,任何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法置身其外^[8]。目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方式简单化一,缺乏多样化,不能有效激发客体兴趣,在实际引领效果上不尽如人意。

1. 引领方式传统单一化

当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方式主要依靠网络单向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同时也借助新媒体比如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官方媒体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但仅仅依靠单向度主流意识形态输出,缺乏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交流,很难引起客体共鸣,容易造成网络意识形态引领效果缺乏实效性。与此同时,各类极端的不法意识形态信息却可能误导网民的精神文明培育。在复杂的网络空间,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体也常常通过微信公众号、人民网等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但在这一过程中客体仅仅成为接收者,缺乏多种形式的思想交流,难以吸引客体,实效性不足。

2. 引领方式缺乏精准权变

进入 21 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实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提升意识形态引领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其引领方式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改革创新。比如在微信等公众平台报道新闻时,可适当引用当前热频词汇吸引民众注意力,激发客体兴趣。当前国内面临防控新冠疫情常态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重大战略形势,各种网络思潮随时可能席卷而来,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常常借助网络渠道,通过各种文化产品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歪曲,试图瓦解和破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显然,依靠传统的引领方式,在执行上容易造成僵化,缺乏精准权变,在实际引领过程中面对不同问题很难进行动态调整,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引领手段和方式。

(四) 意识形态引领资源整合有限,不能完全形成引领合力

意识形态引领主体各部门、各平台各自为政,虽形式多样,但仍然可能造成网络意识形态引领资源松散,缺乏有效整合,无法汇聚和形成引领合力。

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引领方式和平台多种多样,但是实际引领合力仍然欠佳。各单位、各部门自建平台多,共用共享少。虽然其他平台开发较多,但都是部门、行业和地域各自为政,导致资源浪费,部分平台闲置,使用率较低^[9],网络意识形态引领资源未能实现有效整合。比如,各地方学习、传播平台较多,都具有各自特色,但缺乏整合性平台。大数据庞大杂乱的信息源可能弱化国家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各自发声的数据信息充斥于无限交互的网络平台,将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淹没于洪大信息流中^[10]。目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出的“学习强国”平台具有很大影响力,在全国各地党员、干部中得到较好推广,同时整合了各部门、地方学习平台资源,是学习资源较为集中的平台,有利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值得后续网络平台开发等学习借鉴。

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引领资源在各行业各部门存在不平衡现象,资源整合空间较大。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高校等意识形态引领资源较为丰富,能够第一时间从网络上掌握社会最新思想动态,并且可以通过相关文件、网络资源等组织集体学习;相反,基层部分劳动群众由于网络条件不普及、资源匮乏,意识形态资源整合有限,难以快速获取最新资料。当前对于大数据整合资源的功能利用尚不到位,忽视了大数据工具在网络空间中对意识形态资源整合的作用。显然,网络意识形态整合不足、分布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

三、大数据方式契合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要求

(一) 大数据精准捕捉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点

从媒介化社会提出的元宇宙是集成与融合现在与未来全部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终极数字媒介,它将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连接,进而成为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元宇宙是三

维化的互联网,通过XR等技术实现,而大数据技术是包括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平台在内的综合技术平台,它包括数据收集、数据整合、数据分析以及数据挖掘技术^[11]。大样本、多样性、全面性是大数据的技术特点,通过大数据精准定位技术,能够及时捕捉网络热点,识别隐含的风险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针对性预防风险,有助于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识别的精准性。

1. 大数据捕捉网络热点

网络热点问题瞬息万变,一个热点事件从兴起到沉寂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这就需要大数据在较短时间内精准把握热点问题,并给予正确引导。大数据具有精准性,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精准识别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动向,特别是针对一些重大安全事件,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解构网络意识形态热点核心要素、绘制网络意识形态可视化图谱,从而精准捕捉事件热点及其中隐含的风险点^[8],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方案,为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信息导向。

2. 大数据挖掘意识形态风险点

意识形态风险点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网络中的意识形态风险点具有隐蔽性、分散性特点,需要大数据精准甄别和挖掘。手机和电脑是大多数数据资源的来源,通过手机、网页、视频等数据内容能够分析和预测个体(群体)的思想动态以及行为倾向。针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敏感性话题等,可通过网络各类平台等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其隐性的风险点进行针对性的引导和治理。事实上,大数据的精准识别功能能够挖掘意识形态风险点,为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奠定基础。

(二) 大数据及时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兴趣点

高速度和及时性是大数据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关键要求。大数据的海量采集和高速处理能够有效把握意识形态兴趣点。结合“自主性”“综合性”的现代意识理念,应当调动客体参加意识形态引领活动的积极性与完善自我发展的主动性。

1. 大数据及时掌握信息数据

大数据时代数据产生的速度更快、途径更多、传播更广,海量的数据增长需要及时而有效处理,否则数据的价值会很快失效^[12]。大数据具有高速的特点,这也是大数据技术获取信息的关键要求。尤其是社会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快、数据流动大,必须通过大数据与网络平台的结合共享,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有效数据,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从而为在海量数据中识别兴趣点打下基础,有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2. 大数据及时处理分析数据

大数据能够立足对网络信息内容的分类和深度挖掘,从事实类信息、评论类信息等基本信息类型的划分和分析入手,对于新闻事件、热点舆论、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类内容进行及时、持续的数据挖掘和分析^[12],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兴趣点;针对网络平台等出现的引起大众激烈讨论的社会事件等,大数据能够及时把握思想动向,进一步从思想上进行正确引导。大数据及时处理分析数据不仅调动了意识形态引领主体的主动性,而且提升了信息的公开性,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 大数据链接整合网络意识形态资源点

网络意识形态资源是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支撑保障,只有整合丰富的网络意识形态资源,才能进行有效引领。除了高速度和及时性以外,大数据还能够有效整合网络意识形态资

源,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引领能力和效率,有效避免网络平台单打独斗、网络意识形态资源分散等问题,促进网络各主体合力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1. 大数据共建共享云平台

共享云平台是整合网络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建立云平台能够有力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效率和能力。通过大数据信息渠道的有效连接,实现多渠道的信息集成、跨部门的分工协作^[13],建立互联互通的网络云平台,在云平台中汇集网络意识形态资源,达到资源的优化整合,避免各个组织、部门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的平台建设开发模式,实现资源共享、共用。

2. 大数据优化资源配置

网络意识形态资源配置不合理是提升引领力的一大障碍,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形成资源共用共享,是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有力保障。应用大数据云计算,能够统筹协调各区域之间、各行业之间意识形态引领的供给需求,通过大数据绘制意识形态资源供需图表,同时实时更新图表,依据图表变化实行资源合理配置,做到合理调剂,调峰补缺,资源共享,提升效率,避免闲置,保障网络意识形态资源合理有效分配,提升使用效率。

(四) 大数据融入新时代大众网络生活圈

“人类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考者的现存生活环境紧密相连”^[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大众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网络生活圈,而大众在网络生活圈中所展现的意识形态大多是生活化的感性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是指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不同主体利益或需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15]。大数据之所以能够融入新时代大众的网络生活圈,符合大众网络生活方式,正是因为大数据能够抓取大众网络生活动态,从而掌握意识形态动向,进而预测意识形态走向。

1. 大数据抓取大众网络生活片段,掌握意识形态动向

大众的网络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网络生活圈越来越扩大,最普遍的网络生活方式就是社交分享。大众通过手机、移动客户端等渠道来分享自己的生活动态、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等,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数据,其中融入了独特的经历背景、文化学识、利益追求、价值认同等^[15],这些动态通过网络传播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大数据能够利用信息抓取技术,通过对大众网络生活圈中生活片段的抓取,融入大众网络生活圈,掌握意识形态动向。

2. 大数据研判大众网络生活动态,预测意识形态走向

大众的网络生活圈呈现一系列新的特征,语言愈加碎片化、象征化,表情符号愈加流行,使得大众在网络中的表达方式发生改变。网络中的图片、视频等蕴藏着感性意识形态成分,大数据能够对抓取到的大众网络生活动态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解读感性意识形态,将各种相似的网络生活动态归类,绘制大数据图表,进而预测意识形态走向。

四、大数据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路径选择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占领网络主阵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空间,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弘扬主旋律^[16]。实际上,信息时代的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与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着密切关系^[17]。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信息和数据以比特的方式传播和扩散,使得海量的信息能够及时、迅速地传递到世界各地^[18]。在大数据时代,我

们必须将大数据技术嵌入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工作中,着力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

(一) 学习掌握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引领主体的引领能力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在互联网上,而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正是互联网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19]。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必须树立大数据意识,主动学习大数据相关技术,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过程中。

1. 树立大数据意识

在网络意识形态引领工作中,引领主体要把握时代特征,在思维观念上要紧跟时代前沿,树立以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思想意识^[20]。首先,要树立大数据挖掘意识。大数据的海量信息中包含深厚的价值底蕴。比如微博、微信所记录的信息,通过对其中信息进行价值挖掘,可以不断增强引领主体的洞察力。其次,要树立大数据预测意识。大数据能够透过当前实际对未来状况进行预测。引领主体要将大数据融入对网络思想动态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和解决网络意识形态中的隐性问题,提升引领主体的能力。

2. 主动学习大数据技术

意识形态引领主体要站在时代前沿,主动学习大数据技术,掌握大数据核心技术,使大数据技术与意识形态引领完美对接。引领主体要把握大数据时代社会的变革,特别是要主动学习掌握与意识形态引领相关的大数据技术,透过大数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对引领主体定时召开理论专题培训会,邀请专家进行大数据实践技术培训,提高引领主体大数据能力。充实网络平台大数据学习资源,线上线下相结合,促进引领主体主动学习。

3. 善于应用大数据技术

学习技术更要运用技术,引领主体要将大数据应用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在意识形态引领工作中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潜在价值。同时,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保护主流意识形态智能体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比如,在挖掘网络思潮变化时不能依靠传统的方法,要将大数据应用于监测、分析思潮变化,能够及时、精准挖掘数据,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引领主体要运用大数据技术着力加强防护体系建设,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入侵。

(二) 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体制机制,激发客体参与引领的动力

大数据既是信息来源,也是方法技术。利用大数据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就要利用大数据技术介入决策机制、大数据挖掘激励机制、大数据参与协同机制,全面优化意识形态引领体制机制。

1. 大数据参与意识形态引领决策过程,优化意识形态引领决策机制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硬件和软件两种方式,及时、全面、准确地采集和存储各类信息数据^[21],将大数据介入决策机制。大数据对网络信息的收集能够保障数据来源的时效性,通过对实时信息的采集与存储,为信息挖掘奠定基础,为意识形态引领者优化体制机制提供决策建议,优化决策机制。比如通过网上匿名留言本等形式,能够进一步采集到客观、及时的信息数据,通过信息数据对引领机制的记录和反馈,为大数据技术在意识形态引领体制机制优化上提供条件保障和信息来源^[22]。在信息采集与存储的基础之上,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信息数据挖掘与分析处理,总结出客体对意识形态引领机制的意见与建议,使决策者更清晰地掌握实际情况,为意识形态引领者进行科学

决策奠定基础,为引领机制优化提供客体意见,激发客体参与引领的动力。

2. 大数据完善意识形态引领激励系统,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动力机制

意识形态引领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激励机制也是多层次的。利用大数据深度挖掘意识形态引领激励机制,首先,细化激励目标系统。利用大数据分解激励目标系统,使激励系统目标机制由低到高,层层递进,确保激励机制更加详细具体。其次,利用大数据挖掘激励方式方法。进入新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激励机制需要与时俱进才能有效激励。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出激励程度最高的方式方法,将其进一步完善至激励机制中,进而完善意识形态引领激励机制。

3. 大数据协同意识形态引领多方力量,优化意识形态引领协同机制

通过大数据信息渠道的有效连接,统筹各方主体,将政府与各主体整合起来。通过搭建网络相关平台,促进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引领协同机制的完善。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将学校、企业等主体进行整合,在共享平台中共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将线上主体与线下主体整合起来,促进引领主体的协同配合。大数据有利于促进协同机制的完善,优化意识形态引领体制机制。

实践中,实现大数据优化体制机制需要做到:首先,要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意识形态治理的决策过程,利用大数据及时高效收集信息,为意识形态引领决策机制提供信息基础;利用大数据挖掘隐藏信息,促进决策机制完善;其次,要用大数据完善意识形态治理的激励系统,促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最后,要用大数据协同意识形态治理的多方力量,统筹整合各方主体,实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多元主体协同引领。

(三) 大数据捕捉兴趣热点,增强思想引领过程效力

利用大数据对网民思想动态、行为倾向进行分析,判断舆情走向,能够精准识别出网络意识形态兴趣点,增强意识形态引领过程实效性。

1. 精准捕捉网络燃爆点,提升思想引领吸引力

利用大数据精准高效捕捉社会热点问题,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燃爆点。根据网络思想、事件新动态,及时更新网络思想动态燃爆点。比如微博的热点话题排行榜更新速度快,运用大数据统计热点问题的网民点击量、评论量,定位出网民的关注点,能够准确高效捕捉网络燃爆点,提升引领吸引力。同时,将大数据运用到议程数据挖掘分析中,掌握网络即时动态,在获得有效信息数据的基础之上进行议程设置,掌握议程设置主动权。进行议程设置时,要根据社会热点事件融入网民兴趣点,打造吸引眼球的议程,提升思想引领的吸引力。

2. 精准识别网民兴趣点,提升思想引领亲和力

舆情监测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分,通过监测网络舆情能够识别意识形态中网民的兴趣点。通过大数据建立起网络意识形态舆情指标体系,对各平台中的阅读量、点击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偌大的数据库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对网络思想动态进行监测,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兴趣点,契合网民心理特征和兴趣爱好,提升思想引领的亲和力。如微信平台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通过对其公众号相关文章的点击量进行大数据分析,按照点击量以及热度排序,能够精准识别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的关注点、兴趣点,进一步契合网民兴趣点,使意识形态从天上到人间,增进引领亲和力。

3. 精准把握网民诉求点,提升思想引领针对性

通过大数据精准把握网民诉求点,摒弃传统的大规模、多方向的引领方式,在意识形态引领中开展针对性工作。权变管理理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条件的变化进行反馈调整^[23]。通过大数据收集筛

选信息,随时掌握网民真实诉求。意识形态工作者要从融入民众所在的网络生态着手,解答网民所疑惑的问题,贴近网民的现实生活。比如,通过大数据掌握到网民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乡村文化感兴趣^[24],那么在意识形态引领过程中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推出系列影视作品、书刊报纸等,同时依靠大数据信息平台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宣传^[25]。同时,要正确引导网民在意识形态中出现的问题,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对网民的诉求点进行针对性引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引领效率和精准性。

4. 主动融入网民生活圈,提升思想引领实效性

网民的生活圈形式各异,同时形成了各类网络群体。“每个社群都有独特的价值观和心理诉求,拥有不断思考的集体意志,并在生活中遵循简单的规则”^[26]。不同的网络群体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其网络生活圈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大数据要主动融入网民的生活圈,利用大数据分类筛选技术,精准定位同类群体,主动进行价值引领。同时,在网民的网络生活中,利用大数据培养群体意见领袖,引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方向。将大数据主动融入网民的生活圈,提升思想引领的实效性。

引领主体要利用大数据精准捕捉兴趣热点。首先,精准捕捉网络的燃爆点,利用大数据平台后台信息数据,定位网民的关注点;主动进行议程设置吸引眼球,提升引领吸引力。其次,精准识别网民的兴趣点,建立动态舆情监测机制,契合网民兴趣点,提升引领亲和力。比如电视节目《开卷有理》第一季《马克思靠谱》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针对80后、90后群体,以讲故事、脱口秀的形式,来讨论马克思的成长,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年轻人更自主地学习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后,把握网民的诉求点,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的,同时将大数据主动融入网民的生活圈,提升引领针对性。

(四) 大数据整合平台和资源,汇聚全面思想引领合力

整合网络平台和资源,要注重时机、讲究策略。利用大数据整合网络意识形态平台和资源,能够达到资源的优化整合。平台建设是基础,资源整合是关键,数据集成共享是重点,要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整体提升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实现科学引领。

1. 树立共享共治的大数据整合资源理念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综合分析,因此在工作中要避免单一性思维、独立性分析,要形成整体思维,进而实现意识形态引领的系统化。资源整合是意识形态引领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意识形态资源整合中,要树立大数据理念。在网络平台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各平台重复资源及稀缺资源,以此来调整平衡资源分布状况。通过资源整合,才能形成系统的引领机制。

2. 开发合作共赢的大数据共享共用平台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引领平台较多但缺少资源集中的平台。引领主体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搭建共享的网络平台,各组织、各部门通过共享平台进行资源和共享共用,加强工作统筹,推动协同联动。比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发的“学习强国”平台,汇集了各个地方以及各个部门的学习平台,使学习资源整合集中,有助于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效力。通过建设类似“学习强国”的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或APP,有利于汇集意识形态资源,助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3. 实施大数据网格化资源管理整合机制

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社区网格动态管理系统,建立片区网格点,通过各网格点信息互联互通,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领资源的整合及管理。比如,新媒体中的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对各个平台的资源进

行网格点划分,同时借助网格管理系统整合资源,将各平台的资源整合后形成全面的意识形态引领资源。利用新媒体开放性、及时性等特点,积极整合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活动。大数据在整合资源时,充分考虑其时效性,及时更新平台数据资源,通过对网络平台和资源的整合汇集,使意识形态引领力更集中,进一步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27]。

大数据整合平台和资源,首先要打造一体化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将现有平台和资源进行汇总升级,借鉴“学习强国”平台的实践经验,将理论学习资源、视频学习资源相结合,中央组织部门学习资源与地方学习资源相结合,在一个平台上汇集多种资源,提升引领力。其次,利用大数据高速度及时性特点,捕捉报纸、电视、网络中最新意识形态资源,在平台中进行汇集更新,保障平台资源的最新性。

将大数据技术嵌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之中,不仅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需要^[28]。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必须紧随时代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大数据时代有效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改进和完善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和技术,最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29]。在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的主导地位受到一定威胁,必须利用大数据来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求是, 2019(6): 4-8.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1.
- [3] 习近平: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 (2013-08-20) [2022-04-10]. [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3/0820/c1024-22634056. 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20/c1024-22634056.html).
- [4] 蒲清平, 范海群, 赵楠.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10): 22-24, 30.
- [5]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杨燕,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序言 p2).
- [6] 罗丽琳, 蒲清平. 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基因及其时代价值[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45-52.
- [7] 罗丽琳.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时代精神与理性回归[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207-212.
- [8] 蒲清平, 王婕, 朱丽萍.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志愿服务研究[J]. 学术探索, 2017(3): 77-82.
- [9] 邓验, 张莹莹. 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1): 52-56.
- [10]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姚仁权,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76.
- [11] 覃红, 许亨洪. 试论大数据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体系中的运用[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13): 19-23.
- [12] 孙璐杨, 伍志燕. 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J]. 理论探索, 2021(2): 40-47.
- [13] 张世昌. 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论析[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2): 70-76.
- [14] 罗红杰. 论大数据与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5): 102-109.
- [15] 仲昭慧.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 55-57.
- [16] 段海超, 吴楠.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6): 43-46.
- [17] 韩影, 张爱军. 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J]. 理论与改革, 2019(1): 76-85.
- [18] 赵玉枝, 谢玉进.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9(5): 44-48.
- [19] 姜长宝, 任俊霞.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困境与破解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9(11): 110-113.
- [20] 郑敬斌, 刘敏. 坚决打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攻坚战[J]. 红旗文稿, 2019(10): 28-30.
- [21] 阳作林, 张艳艳.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8): 83-85.
- [22] 万颖. 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3): 90-92.
- [23] 杨润聪, 洪向华.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12): 188-192.
- [24] 汪宏. 乡村文化建设“造形”“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J]. 理论与改革, 2022(3): 145-154.
- [25] 冯刚, 陈倩. 解构与重构: 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J]. 探索, 2022(3): 166-175, 2.

- [26]张东,高虹,周强. 疫情背景下自媒体舆论治理的经验评价、困境反思及实践进路[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20328.1906.006.html>.
- [27]刘小源,梁罡.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价值、挑战和实现路径[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21-25,43.
- [28]徐国民,孙文秀.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提升路径探析[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1(4):133-139.
- [29]段鹏. 5G背景下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遇、挑战与创新路径[J]. 中国出版, 2021(6):20-25.

Big data boosts mainstream ideology leadership research

LUO Lilin¹, PU Qingping², HUANG Yan³

(1.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P. R.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3.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Nanchong Municipal Committee, Nanchong 637000, P. R.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once stressed in the nation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conference that, “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work of the Party. We must hold the leadership, management and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work firmly in our hands, and at no time can we neglect it.”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new space for consensus building. It is vital to enhance the leading power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e internet. However, the leading ability of the current network mainstream ideology cannot fully adapt to the complexity of cyberspace, the leading mechanism cannot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object, the leading methods are lack of effectiveness, the leading resources integration is limited, and the leading force cannot be fully formed, which cannot fully adapt to and meet the needs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big data approa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eading forc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e network,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big data accurately captures the risk points of the network ideology; second, big data timely grasps the interest points of the network ideology; third, big data links and integrates the resources of the network ideology; and fourth, big data integrates into the “network” life circle of the public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hinking and methods can improve the leading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improve the leading ability of the leading subject, and improve the leading subject’s ability by establishing big data awareness, actively learning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being good at applying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second is to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of the o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uidance, and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of the objects by optimizing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enhanc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optimiz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The third is to gather a comprehensive thought leading force, through accurately capturing the explosion points of the internet,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interests of netizens,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demands of netizens, and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life circle of netizens. Fourth,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hought leading process by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big data integration resources for sharing and governance, developing a win-win big data sharing platform, and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big data grid resourc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above four aspects, w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eading for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yberspace.

Key words: big data; mainstream ideology; leading; cyberspa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curity of ideology

(责任编辑 彭建国)